

借笔墨沟通世界

——谈梅国云的“字相”艺术

□童振诗



梅国云作品《双福》

梅国云对我来说是长者。长者为尊,这个尊不是身份尊贵,而是他为人、为文、为艺都值得尊敬。触及他的作品,会有一种“触礁”的感觉,会陷落于其用笔墨构筑的意境世界当中。他的笔墨作品,总会让人省思文字意象之外的人间百态世象。可以这么说,他的作品不止于审美、不耽于意境、不囿于哲辩,而是一种接地气的、在场的叙事创作。他的作品和我们所处的世界及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,并非苍白、空洞的。他所构筑的艺境来自思想的“黑洞”,是有话要说、有所指向的。他的作品看起来似为“常”,却又“非常”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梅国云的作品所使用的媒介,与一般传统山水画和书法的媒介是一致的,都是笔墨纸砚,都是基于汉字形体的象形来进行创作。所以很多人把他的创作称为书法作品——这为“常”。但我个人无法这样去述说他的作品,也无法把他的这些笔墨作品简单称为书法。

传统的书法自有其法度,几千年来经过总结归纳,已经形成了自己内部的一套话语体系。传统书法每一笔、每一划的停顿转折、力量轻重、字与字之间的空间布局,都各有其度,有其成熟的审美标准。书法用点画线条来体现它无限的表现力,由于点线本身极度抽象,因此我们只能从力量、节奏、空间去感知创作者内在的精神气象。这类艺术作品属于“内宇宙”的暴发,是内敛的、不及物的,它存在于审美维度,用高超的技艺来陶冶情操、净化心灵。欣赏它,只能游于艺,不能外于世,它展现的是个人的意象,无法走出意象之外,与人世发生关系。如前年黄庭坚的书法,优游不迫、穿插有法,追求的是个人的精神超越。他写字时从不以工拙为计较,看世间万缘,都如“蚊蚋聚散”。字臻至此,人亦世时不再与他建立直接的关系,只是他眼中的景。而在复杂化的社会面前,这样的艺术总是让人感到小小的遗憾。它跟我们有遥遥距离的。

如果在这种传统的书法艺术审美语境中去观察和欣赏梅国云的作品,简单地来判定,那么得出的结论是:这些笔墨作品在传统书法这条道上不值一提,甚至是“非法”的。它是非标准的书法,或者说不是书法。梅国云的笔墨,无意于书法技艺的刻画,他不是要进入传统书法美学的系统内部,而是另辟蹊径,通过回归文字本身的象形所指,借笔墨来沟通世界,通过笔墨意象之外的意味与社会建立种种关系,表达自己在场感。这和当下的艺术流变息息相通。

当今世界,自然物的空间越来越小,人与他者、与

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,要使艺术“幽栖穷岩,外缘两绝”是很难的。可以说,我们处在一个“大系统”时代,艺术的发生很难自绝于当代社会,有思想的艺术家很难对世象视而不见,艺术与艺术家本身都有强烈的走向公众的欲求。艺术如今在不断向公众展示它无限的可能性,“美”早已不再是艺术唯一的标准名片。

我们都知道,在今天,任何东西都能经由艺术家变成艺术品。艺术家的创作是自由的,所使用的材质不再拘束于某种单一的特定媒介,只要存在的材质,都可以对其进行艺术创造。当代艺术家常会打破可能的存在边界,让无限可能性的创造得以实现。要达到这样的艺术目的,那么,重复过去、重复他者就意味着对艺术的伤害。

技术只是达到艺术的手段,技术并非艺术。技术的好坏不能成为评判艺术的关键。在这种语境下的笔墨书写,即便技术纯熟,倘若只是机械似的书写,是不入人心的模仿和重复,不管是否达到标准的技法,都会显得形迹可疑。梅国云的笔墨作品,则试图用艺术去沟通这个世界,当中有很多作品,皆对社会现象与自身思想有强烈的所指,想要跨越笔墨平面的限制,

创作谈

甲辰年的桂花晚开了,《迎春纪》也赶在秋天的最后时刻出了世。

《迎春纪》一以贯之以老武汉为背景,且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汉口之春》似是姊妹篇,因书名都带着春字,连主人公的名字也一字之差,一个是宝春,一个是迎春,还同为私生女。然两部作品从时间和背景已有了区分,《汉口之春》写武汉渡桥一带普通民众的生活,时间跨度是从武汉解放前夕至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,《迎春纪》则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末,背景选择了汉口的汉正街与汉阳的洗马长街两个重要地标。两部作品都写到了20世纪50年代,但《迎春纪》的内容更为丰富,也是对那段历史的重要补充和拓展,由此呈现的风貌更为多姿多彩,小说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个性特征也各有不同,命运迥异。

作品的蕴涵与创作的早晚有关,也与作者的经历有关。《汉口之春》出版于2013年,写作很顺,仅用半年就完成了。《迎春纪》则是疫情前开的头,写了3万多字,却没做好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准备,就放下了。

2021年初冬,我来到久违的汉正街。20世纪80年代,这里成为全国首个小商品批发市场,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不断上演,名噪一时的电视连续剧《汉正街》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商人的故事。90年代初,我也曾在此居住过几年,当时的家就在花棚巷里,从朝南的阳台越过层层叠叠的屋顶,就能感到悠悠的汉水。我深深感受过汉正街的嘈杂和喧闹,对摩肩接踵人挤人的堵塞场面记忆犹新。如今,混杂着各种商品气味的狭长老街已不见踪影,道路都扩展了,高楼大厦取代了高低错落的老房子,充满时尚气息,商铺也都搬进楼内,成为商城。走到大夹街深处的药帮巷,才找到一些旧时的痕迹,那条“硕果仅存”的青石板路,蜿蜒百米长,两旁依旧是老房子,市二色织布厂的四层白楼所幸还在。我在那门前站了好一会儿,回想曾外祖父、外祖母曾从这里进进出出,不免心绪万千。

往事历历如前,石板路似在延伸,狭长的正街望不到头,店铺招牌密密匝匝,烟气袅袅,人声喧闹,我穿行在人流中,就像迎春上街时一样。小说于是有了进行下去的可能。

然而,我与大部分人一样,对汉正街的印象还停留在80年代后火遍全国的小商品市场,曾以为它的起步也是这个时期。现成的资料和一些文学作品也都是80年代后的汉正街,此前的内容寥寥无几,唯有清代竹枝词记录一些曾经的景象。但药帮巷让我的思绪得以拓展,如同当初写《汉口之春》一样,想跳出80年代的模板,向更悠远的岁月回望。

这自然是了解历史后的拓宽。都知道武汉分三镇,然从隋代起,这里就形成汉阳、武昌“双城夹江”的格局。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,将汉阳一分为二,劈出一个水汪汪的汉口,随后各处商民渐渐在水口两岸建房造屋,商船来此停泊,过去沙滩芦花、鱼跃兔飞的泽国迅速发展崛起。汉口形成后,不仅在武汉三镇中后来居上,且一跃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。汉口因河而兴,因商而活,“十里帆樯依市立,万家灯火彻宵明”,写的就是当时汉口口岸(汉正街一带)的繁荣景象。汉正街是汉口之正街,也是设立许多地方官署的官街,汉正街是汉口商脉,是汉口的城市之根,当然是反映武汉这座城市沧桑变化的重要窗口。

汉阳的洗马长街也是多年的关注点。曾经的洗马长街是汉阳最具特色之地,商业繁盛,人文荟萃,傍依久负盛名的晴川阁,背靠三国时建造鲁山城的龟山,唐代诗人崔颢曾站在黄鹤楼上眺望长江对岸的绮丽风景,触发诗情,留下“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”的名句。白驹过隙,沧海桑田,如今仅存有一个洗马长街的路名,现存的资料和图片也是寥寥无几,文学作品几近空白。由此,再现当年的汉正街和洗马长街,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背景,实为一件有难度的事情。于我而言,从最初写30年代汉口徽商爱情命运的中篇处女作《百年之约》起,冥冥之中似有一种指向,之后《汉口的风花雪月》《武汉的沉香浮影》等一批老武汉系列小说陆续问世,确如立下约定。我总想拾掇那些遗失的精华、蒙尘的珍宝,这成了我长久以来的追求,乐此不疲。

《迎春纪》的创作过程缓慢而艰辛,资料奇缺,时常因无米下锅而停滞不前。每到这个时候,就得走出去,寻访旧迹,大海捞针一般四处搜寻可用的材料。这个过程繁杂而琐碎,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,再变成小说的元素。但又不能天马行空地随意编造,要尊重历史真实,才能得到读者认可和信服。历史小说的真实性,并非只来自简单的史实再现,而是人物与时代水乳交融,历史与现实勾连,使作品具备更丰富的精神内核。每部作品问世,都是向读者交一份答卷,下了多大的功夫,逃不过读者的眼睛。虽说我写老汉口已被众多读者熟知,却不取因之前的褒奖而陶醉,反而更加小心谨慎,唯恐读者厌倦和失望。写一部长篇小说确是一次修行,也似登山,需要储备足够的脑力和体力,舍弃身外的负累,心无旁骛,经过无数阻碍和险境,才能抵达南方的修成正果。

《迎春纪》虽以女主人公迎春的命运为主线,但涵盖面广,力求从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,以更富时代性和厚重感。小说以迎春出生的兔年起笔,正是不同寻常的1927年,北伐军在武汉建立国民政府。20世纪20年代,正是汉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,依托得天独厚、的自然条件,长江航运和京汉铁路两擎并驱,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会。武汉国民政府虽只有短暂的几个月,但对武汉影响深远。也是这一年,三镇才正式有了武汉市命名。

迎春的足迹在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上延展着,如同她颠沛流离的命运,从汉正街到洗马长街,她眼里的场景渐渐变成长长的画卷。她本可以一直画下去,但父亲的惨死改变了她,她逐渐从懵懂的小姑娘成长为能干的小会计,并走上革命的道路。她的哥哥吕汉树的成长轨迹是另一条主线,由此拓宽了小说的维度和视野。汉树本是我一位祖辈亲人的名字,以此纪念,也恰到好处,表现了武汉人豪迈坚定的性格。

小说写到百废待兴又意气风发的50年代,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渐次展开,如解放之初新生政权与敌特的生死较量,抗美援朝,1954年抗洪胜利,公私合营,以及建设中新苏友好宫和武汉长江大桥等。中苏友好宫即曾经的武汉展览馆,是老武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。我不仅描写了当时的情景,还特地附上一幅插图。

我不擅绘画,偶尔涂鸦。那日心血来潮画了一幅《迎春上街》,发给责编朱辰辰老师,宋老师看后回复,这画很有意思,可以做插图。得此鼓励,我脑子一热,夸口再画几幅试试,就是赶鸭子上架,便冒着炎热陆续又画了5幅,其中《迎春在汉阳江滩》还用在了封面上。

十年前,我写了一部描写1938年武汉抗战的长篇小说《倾城》,首次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,与《汉口之春》《大智门车站》一样,入选中国作协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。此次《迎春纪》再次得到作家出版社厚爱,不仅予以小说文本重点的尊重,还给予作者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,实为此书的幸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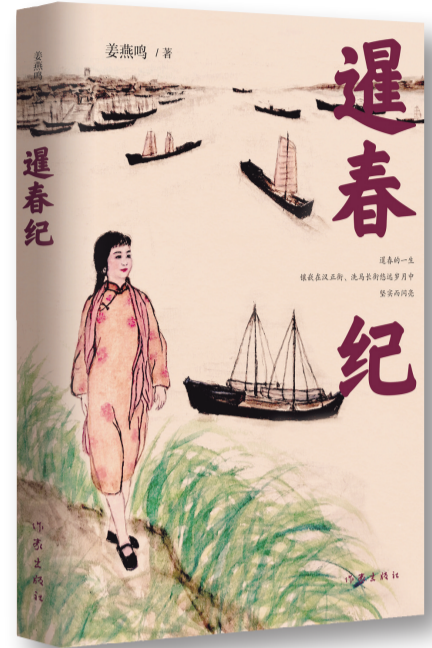
2018年2月,我有幸成为汉字“遑”和“瑛”的守护者。瑛,让人不禁想到《红楼梦》里的“神瑛侍者”,而后,我将苏瑛作为中篇小说《莫失莫忘》女主人的名字。遑,日光升起的意思,用以早年迎春卯时生的迎春,似乎天赐。

甲辰之春,汉阳晴川阁花红柳绿,我在清朝名士毛建所书“山高水长”的碑坊旁流连徘徊。康熙甲辰龙年的一天,在晴川的绿荫下,毛先生借着醉意挥毫泼墨,写下这雄浑豪放的四个大字。

300年后,受先生之风浸润的迎春,重拾画笔,准备再绘晴川。又一个甲辰龙年,一部描写她半生传奇的《迎春纪》,也应运而生。似一场轮回,彼此穿越不同时空相逢了。

念你如遑

□姜燕鸣



《迎春纪》,姜燕鸣著,作家出版社,2024年11月

唐宋文豪的生命意志

——读桃气《最是人间少年狂》有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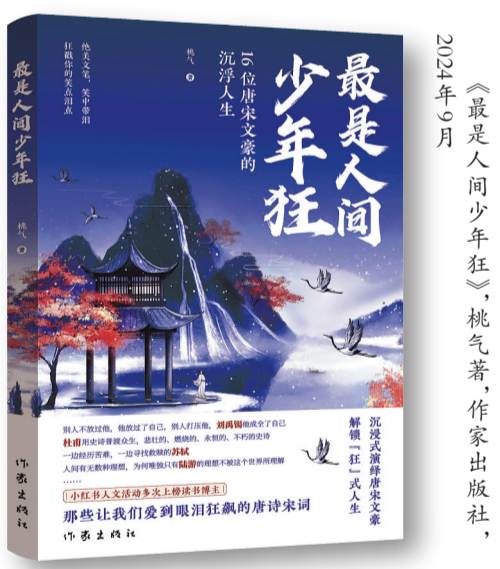
□段宗社

课中选篇众多,此外也许还有一种引领主旨的用意。作者在标题位置引述了他的两句诗:“种桃道士归何处?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并用今人口吻加以批注:“只要整不死,就豪横到底!”我猜想桃气是要拿刘禹锡的“豪横”来引领全书主旨。全书的总名是“少年狂”,所要表现的总体精神就是“豪横”。唐诗有“颍川豪横客,咸阳轻薄儿”,“豪横”给人一种生命力健旺的少年气象。这不是一种老于世故、圆滑狡黠、精致利己,而是一种笑傲江湖、不低头、不屈服的正直气魄。

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出生,他们一生都在诗酒唱和。白居易写诗给刘郎说:“诗称国手徒为尔,命压人头本无奈何。”说好友诗写得好,命运却很糟糕。正如选在课本上的那首著名的诗所说:“巴山蜀水凄凉地,二十三年弃置身。”刘禹锡出身官宦世家,贞元九年(793),年仅22岁就进士及第,十年后官至监察御史,有机会参与顺宗朝的“王叔文变法”,结果顺宗早逝,即位宪宗皇帝打击变法,王叔文被赐死,刘禹锡、柳宗元等参与者被贬到偏僻荒凉的西南州郡作司马,史称“八司马”。十年后的元和十年(815)二月,刘、柳等人被召回京,本来有一次复职机会,但刘禹锡写了一首《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,说“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”——我刘郎被贬出朝,你们才有机会的。“看花诸君子”是哪些人?肯定有尚书省的新贵,他们读了是什么感觉?一个戴罪之人,好不容易有回京复职的机会,理应深居简出、谨言慎行才是,他却如此张扬,结果是“人嘉其才而薄其行”。这年三月,朝廷下诏,刘禹锡为连州刺史,柳宗元为柳州刺史,被贬到更远的地方。

其后又过了12年,期间宪宗皇帝被宦官所杀,穆宗驾崩继位,敬宗即位的第4年,大和二年(828)三月,由宰相裴度等人荐举,他再一次返回长安,任主客郎中。当年三月,又是桃花盛开的时节,玄都观中已经没有桃树,他还是前往游览,又作了那首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的绝句,还加上一段长长的序言,声明“以俟后来”——让人觉得他又有点膨胀了。果然,大和五年(831)十月,60岁的刘禹锡再次外放,出任苏州刺史。欧阳修在传记中不无惋惜地说:“终以恃才偏心,不得久处朝列。”“偏心”语出《史记》,司马迁称汲黯为“偏心之人”,而李德裕却称汲黯为“豪侠”,说他是历史上少有的“义气”之士。可谓所谓“偏心之人”,其实是偏执而不善迎合变通之人。这样的人往往入心入骨,不会因为功名利禄的诱惑而变得圆滑世故。

我赞同桃气以“豪横”称道刘禹锡,这是一种面对命运的姿态。他二十三年被弃置在外,却依然有沉甸甸的文学业绩。他的《陋室铭》,是古代“铭”体文中写得最好的,五代时就有入推崇摹仿,今天更是初中生必背篇目。他写有“秋日胜春朝”“为霞尚满天”这样的千古名句。《竹枝词》《金陵五题》等一直是大学生语文课程的必读篇目。白居易称他是“诗豪”,以为他的诗无人能敌。唐武宗会昌二年(842),年逾古稀的刘禹锡预感自



《最是人间少年狂》,桃气著,作家出版社,2024年9月

己到了生命尽头,奋力写下一篇《子刘子自传》,称“建桓立顺,功归贵臣”——皇帝的废立,都是宦官说了算,勇敢地道破朝廷真相,并为早年亲身参与的“变法”作了最后辩解。是的,一个人在命运的重压下依然能够昂首,能够直言不讳,岂不就是“豪横”?这背后有健旺不屈的生命意志做支撑。我猜想《最是人间少年狂》这本书,贯穿始终的主旨就是这四个字:生命意志!拥有强健的生命意志,在人生的波涛中沉浮。只有豪横不屈,方能呈现一种价值,一种精彩。

最欣赏桃气在写苏轼时所引述的陆游的几句话:“公不以一身祸福,易其忧国之心,千载之下,生气凛然。”说苏轼不管身处何种境地,都把国家社稷安危置于个人祸福之上。这又何尝不是陆游本人的平生意愿!桃气写到陆游时说:“曾经无数感伤,却没有一次是为自己。他的心太大,装得下整个国家;他的心又太小,小到只有国家,掺杂不下丝毫的世俗,连做梦都是在杀敌途中。”不只是陆游,还有李清照,她鄙视丈夫怕死不抵抗的行径,写下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这样的诗篇加以讽刺,这首诗成为后世志士仁人的强心剂。也不止易安居士,书中的16位文豪,哪一个不是将国家大义置于个人祸福之上?贫穷卑微如张籍者,本可以依附节度使李师道而获得富贵,但他明白自己不能跟无良之人合作,于是用一首“恨不相逢未嫁时”委婉拒绝。《中庸》云:“君子居易以俟命,小人行险以徼幸。”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君子,都乐天知命,以简易恒常之心对待命运。

桃气书写16位唐宋文豪的传记,也是在为流播千载的道义和正气代言。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”作者用轻快的笔墨,将文豪们的诗篇和故事一一讲述,各人境遇不同,各有各的趣味和精彩。读者披文入情,从每一篇文字中都能感受到一股“凛然生气”。

(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)

早年在中学教书的时候,我们语文老师都特别热衷于指导学生阅读各类人物传记。罗曼·罗兰《名人传》中有关贝多芬的文字,经常被老师和同学们深情朗誦,我们还会摘取其语段编成试题,引导学生领悟人类面对苦难的毅力与不断进取的精神。还有《美国十二名人传》,勇敢的护士克拉拉·巴顿,在瓦尔登湖畔亲近大自然的梭罗,以及慈善家卡内基,都是同学们津津乐道的人物。更多的是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,如《史记》中的汲黯、李广传,《汉书》中的苏武传、《后汉书》中的蔡伦传等,都要印发给学生反复阅读。读名人传记,直接的好处就是积累作文素材,高考作文经常涉及个人成长的话题,伟大人物的人生故事是可靠的励志材料。另外,高考语文中的文言文阅读,大多数年份都会选中国史书中的人物传记作为阅读材料。所以,阅读各类人物传记,了解诗文佳作的创作背景,简直就是语文学习的基本功。

今读桃气《最是人间少年狂》一书,觉得这不就是一本我们语文老师特别感兴趣的传记作品吗?全书16篇,每一篇都以一位文豪的大名为题。唐代9位:张九龄、刘禹锡、李白、杜甫、韦应物、张籍、白居易、元稹、温庭筠;宋代7位:柳永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轼、李清照、陆游、辛弃疾。16位文豪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作品选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。你可能觉得张籍不那么有名,但别忘了他的《秋思》绝句就在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里:“洛阳城里见秋风,欲作家书意万重。复恐匆匆说不尽,行人临别又开封。”这本传记作品中的16位文豪,显然出自作者们的精心选择,了解这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古典诗作作家的生平事迹,无疑可以陶冶情操,提升语文素养。

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两句写月光诗,早在小学三年级就会背了。这两句出自哪一首诗?谁写的?读本书第一篇《张九龄》,所有答案均在其中了。张九龄是开元盛世的宰相,到开元后期,玄宗皇帝听信奸相李林甫,随意提拔节度使牛仙客做四部尚书。张九龄和监察御史周子谅坚决反对,结果周被杖杀,张被贬为荆州长史。这首《望月怀远》就是诗人在荆州城楼孤独望月时吟诵出的,想象作者的处境及当时的具体场景,会对这首诗孤独怀远的心境有更多理解。在荆州贬谪期间,他写出了一生中最好的《感遇》十二首,其中第二首被薛衡退士放在《唐诗三百首》第一首的位置,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”是这首诗的最后两句。桃气写张九龄,就从这两句诗引出,她说“草木并非草木,美人也并非美人”,那是什么?原来“草木”是一位名相被罢黜后的自我认定,“美人”隐喻皇帝。何谓“本心”?张九龄坚持认为官爵封赏事关国家兴亡,不可奉承,他引《左传》“国家之败,由官邪也”,这就是一种信念和担当。可惜他引经据典试图说服皇帝,却被李林甫指为“拘于古义,失于大体”的“文吏”习气。史书记载,张九龄被贬之后,朝廷大臣“持禄养恩,无敢庭议”,大家领着朝廷的俸禄,没有人再敢坚持正义、抵制邪恶,安禄山这样的奸人趁机上位,唐朝的覆亡由此肇端。桃气说:“当我翻遍那一摞摞厚厚的史册,果然发现看似风轻云淡的诗句背后,竟然隐藏着那么多血泪与悔恨交织的前尘往事。”阅读诗歌,就是要“知人论世”,就是要回到诗歌本身的历史背景。《最是人间少年狂》一书,无疑为唐宋诗词提供了广阔而细致的历史背景。

刘禹锡的诗名比不上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,而且出生比李、杜晚得多,但作者把他的传记放在了第二篇的位置。突出刘禹锡的地位,固然是因为他的诗文在语文